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中心线索问题研究

中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ZHONGGUO ZIBENZHUYI DE FAZHAN
HE BUFAZHAN

汪敬虞 著

不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

——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

汪敬虞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 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汪敬虞著.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10

ISBN 7-5005-5352-8

I. 中… II. 汪… III. 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国-近代 IV. 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429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875 印张 354 000 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定价: 35.00 元

ISBN 7-5005-5352-8/F·4745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我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 线索问题的认识过程

本书的最后完成，是在著者已经步入衰老之年、离开工作岗位退休之后。但是它的酝酿却有相当长的一段前史。在这个前言之中写上几句有关这段前史的历程，也就是我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认识的经过，或可作为读者了解本书之一助。

这本小书内容的构思和写作，着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在我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年一卷中，就已经搞出了一个粗坯子，作为该书的导言。这可以看作是我着手写作的开端。然而，我最初接触和初步思考这个问题，则在此之前30年，也就是20世纪的6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时候。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担任领导的严中平先生主持之下，参加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有一段时期前前后后大约有3年是与所外单位合作进行的。由所内同仁合作的小集体变成所外单位协作的大集体。规模扩大了，准备工作也加重了。仅在拟定提纲阶段，单是讨论提纲贯串一个什么主线的问

题，就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这个主线，就是严先生在讨论会上首先提出来的。对于这条主线当时讨论中就有不同意见。在我的记忆中，讨论的气氛是热烈的，但比较空洞，最终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随后就是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先是四清，接着是十年动乱，编写工作全部陷于停顿。等到十年动乱结束，重新由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单独编写时，20年前热烈讨论的这条主线已成明日黄花。在另起炉灶的编写过程中，包括主编严中平先生在内，已无人再重提旧事了。

然而我个人却仍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我之所以如此，也有一段前史好说。

根据我的记忆，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的确是严先生的首创，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这样一个提法本身，却不是来自严先生，而是首先出自一位到所不久的青年研究人员之口。原来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在1953年根据上级指示，发动全组人员齐编共纂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时，其中《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的编纂，最初就是由我和这位青年共同承担的。在我们两人开始起步的时候，这位青年经常结合资料的编纂向我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的问題。但这只是在一个办公室内的闲谈，谈罢也就过去了，并没有引发我的深入思考。可惜我们俩人的合作，为时不到一年，就因他的过早离开人世而中止，因而我们之间的这一闲谈的印象，也就日趋淡漠，随即为人所遗忘。然而这一提法，还是传到严先生的耳朵里，并且得到了他的激赏。等到严先生为主持《中国近

^① 根据我的记忆，在当时的讨论中曾提出了两个相持不下的中心主线，即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崩溃的中心主线。

代经济史》的编写而撰拟提纲时，从生产方式的嬗递这一角度，把它提高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的地位，“对其他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都应该联系到这条主线上来”，令人耳目一新。这才真正挑开了我的思考，引起了我对它的重视。多年以后，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心目中，中心线索就像一支糖葫芦棍，是贯穿事物整体的一条主线。通过这条主线能更紧密地联结主体的各个部分，更好地认识主体。一部历史，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有没有中心线索，形象地说，就看它是像一串糖葫芦，还是一口袋土豆。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中心线索，就不止是单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状况的描述，如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微弱发展、初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等等，而应该提到理论的范畴中来，提高到质的分析的水平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这个提法，我个人认为基本上符合这个要求。在我的设想中，这样一个提法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即提发展时要着重分析和研究它是怎样发展的；提不发展时要着重分析和研究它为什么不能发展。这两个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我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观察点”^①。当然我的这一点意见，主要是从严先生的提纲和后来的讨论中得到的启发，谈不上有什么深思熟虑。但也不完全是不加考虑的随声附和。它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还是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有自己的一定认识成分在内。这要从我开始参加研究工作谈起。

我从1943年离开学校以后，一直在研究机关从事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我的第一项研究工作就是在国民所得专家巫宝三先生指导之下、参加他主持的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国民所得的估计和分析。这是一项中国经济的宏观研究。我承担的是其中工业所得

^① 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2—3页。

的估计工作，也就是包括现代工厂和手工业在内的工业生产总值和净值的估计。这里我想讲一个小小的插曲，它有助于阐述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在完成抗战以前中国工业所得的估计以后，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生产状况作进一步研究的意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 1943 年 4 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英、德、美三国的工业生产、生产率和分配，1935—1937》(Industrial Production, Productivity and Distribution in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5—1937) 的论文。文章的作者是这方面的一位专家罗思塔斯 (L. Rostas)，内容与我当时对中国工业生产所取得的各项估计，非常吻合，在很多方面可以与之比较。因此我产生了进行比较研究的构想，不久就写出了一篇英文的初稿。这篇草稿当然是很粗糙的，后来经巫先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根据新的结构，他重新撰写了第二稿，后来也发表在 1946 年 9 月号的《经济学季刊》上面。这篇文章分别就工业生产规模、工业就业规模、工业生产结构、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和工厂生产中的收入分配五个部分，展示 20 世纪 30 年代上半期中国方面的状况，并与同期英、德、美三国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在工业生产规模方面，美国工厂的净产值是中国的 162 倍，德国是中国的 64 倍，英国是中国的 50 倍。在工业就业规模方面，从工厂工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看，英国为中国的 34 倍，德国为中国的 31 倍，美国为中国的 22 倍。在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方面，从工人人均净产值看，德、英两国均为中国的 9 倍，而美国竟为中国的 19 倍！在工厂生产中的收入分配方面，从工资在净产值中所占的份额看，则又完全倒了过来。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工厂的工资支付在净产值中所占的比例，都大大超过德、英、美三国。这说明中国

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低下。因为资本投入的规模越小，劳动力分配的份额就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所得的报酬越高，相反，这意味着劳动力的较大投入，从而是劳动力报酬的较低偿付。总之，发展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一直到 20 世纪的 30 年代，仍然停留在这样一副落后的状态之下，这是我和巫先生原来不曾料到的。这的确称得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它使得巫先生在定稿中的两个地方一再使用了 Appalling 这个词，来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态。也就是说，这不是一般的惊异，而是惊异到了可怕的程度！

写这样一个插曲，为的是要澄清一个和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关的问题。

不久以前，我收到日本学者久保亨和牧野文夫两位教授合写的一份题名为《中国工业生产额的推计：1933 年》的学术报告。报告对巫宝三先生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中关于工业部分，也就是我所承担的部分的估计方法和结果，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和详尽的修订。可以看出，两位教授修订工作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不管修订的结果如何，他们这种认真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而且还应该指出两位教授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工业生产的实绩，给予这样高度的关注；对它的修订和重新估算下了这样大的功夫，并不止于单纯的繁琐考订，而是为了要说明一个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他们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出：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为探讨民国时期（1912—1949 年）中国工业的生产规模及其结构而进行的必要的基础工作”。这个工作之所以需要重新的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的学者“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巨大影响，认为处于这种社会形态下，民国年间的中国经济很难得到发展”。这些学者“对民国年间的中国经济

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未能予以正确评价，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估计偏低，这种倾向十分严重”^①。两位教授还进一步更有针对性地说：“在大陆，为了论证共产党政治统治的必要性而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和编制的统计，很难成为客观的学术研究”^②。

中国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中，有没有这种倾向存在呢？应该承认，这种情形是不能尽免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承认，也有不少学者并不像两位教授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在认真地进行经济史的研究和统计的编制的。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肯定的是，我在进行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和统计的整理编制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并没有真正的认识 and 了解。在进行估计工作之前以至整个过程之中，并没有想到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更没有规定一个事先设想好了的目的。我和巫先生都是在看到估计的结果以后才动手写出后来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面的那篇文章的。我们的惊异到了可怕的程度，说明“中国经济很难得到发展”是我们当时也不曾料到有如此严重、然而却是活生生的客观现实，而不是如两位教授所说的“是为了论证共产党政治统治的必要性”而有意进行不客观的研究和统计编制。我们没有事先设立一个要达到的目的，更没有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去胡编乱造一些统计数字去加以“印证”，也没有不顾事实去乱下结论，这对保持一个学术工作者的良心而言，差可引以自慰。

这篇文章的中译本，在巫宝三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在2000年1月的《经济研究》杂志上。《经济研究》编辑部赠我以宝贵的篇幅，让我有一个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巫宝三先生逝世周年

① 久保亨、牧野文夫：《中国工业生产额的推计：1933年》，日文本，第1页。译文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许攸研究员的译本。

② 久保亨、牧野文夫：《中国工业生产额的推计：1933年》，日文本，第1页。译文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许攸研究员的译本。

的机会，这是我非常感激的。不过，这篇文章的翻译，在此之前11年，却已由一位青年朋友根据我的请求早已把它完成。这篇译文的底稿，在我手中保存了11年之久，这就不能不涉及到11年前的一场和本书内容有关的学术讨论。它是本书形成的一个重要关节，尽管后来没有机会把这篇译稿及时公布出来。

距今11年前的1989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一次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讨论。这是一次对我极具启发意义的讨论。讨论采取了笔谈的方式。有全国各地的十几位学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面进行了笔谈。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受到参加笔谈的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的审视和评议^①。应该说，本书的形成过程，也是吸收、消化这些评议的过程。今天回顾仍然使我深深感到讨论和交流对深化认识的力量。

在这次笔谈中，有不少学者认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是可以接受的，但只能提发展或者是提缓慢发展，不能提不发展。

这种意见有两个论据：一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展与事实不符。它是有发展的，不过进程缓慢。总的趋向是缓慢地发展。二是指出“不发展”论实际上是“沉沦观”的一种新形式。它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但随即用“不发展”来淡化乃至取消这种进步的意义，用“不发展”来说明在总体上中国近代仍是“历史的沉沦”。而“沉沦观”是不能接受的。

第一个论据，比较容易解释。我们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指的是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它虽然也概括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但主要是突出发展的特点，是作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中心线索而提出的。而且即使就实际的发

^① 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展过程而言，既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逻辑的结论也就是缓慢的发展。只要它不影响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缓慢发展”与“发展和不发展”的提法，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关于第二个论据，问题的核心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本身，即对所谓“沉沦观”的理解上。应该说明提“沉沦观”这个词，并非自我开始。就我的理解而言，所谓沉沦并非具体实指社会各项生产指标和全体国民收入、消费，都呈向下的负增长的趋势。一个完全停滞乃至负增长的社会，在历史上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此所谓沉沦，与其说是全面的负增长，毋宁说是没有发展的前途。而上面所说的用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来淡化乃至取消这种进步的意义”，这里的“进步”如果指的是整个社会，那就不需要淡化。因为它本身就是不进步的，没有发展的前途；如果不是指整个社会，而是单指资本主义本身，那就不是今天谁去淡化它的问题，而是当年内外反动势力对它的扼杀问题。有一位也不赞成沉沦观的学者在全面论证近代中国社会的全局以后说道：“中国近代经济史仍然是一部失败的历史。”“历史无情”^①！这一概括非常好。它表明了扼杀力量的存在。中国近代经济变化的全过程中什么力量失败了？不是别的，是资本主义。历史对什么无情？不是别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无情。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也不是可以随便淡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困境中的发展要求，不能淡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困境，也不能淡化。我在讨论的后期写了一篇《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的文章^②，至少说明我没有淡化中国资本主义在困境中的发展要求。

应该说，《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织的笔谈，只是当时学术界

①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40页。

② 见《近代中国》，1991年第1期。

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在这一场历史不算太短的讨论过程中，对我的看法提出批评和商榷意见的，除了上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变发展这个提法是否恰当以外，至少还有两个理论性很强的重要质疑：一是外因论的色彩；二是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

关于外因论的质疑，我在本书中已经有所回应（参看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小结），这里就不重复了。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这是我原来没有意识到的，现在把两个有代表性的意见征引于下：

一个是李时岳先生的意见。他在专门与我讨论的一篇文章中说道：“从字里行间仔细寻绎，汪先生的思路似乎是这样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未老先衰，不可能指望用它去取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极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既不能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不发展其实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不断加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方向’。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是不可指望的。而且是应当排除的，因为它会把革命引向妥协。绕来绕去的结果，最后还是回到了起点，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红线’。如果我的寻绎没有大错，这便是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一个经济史的研究者竟作出了历史发展可以不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①。

二是刘振岚先生的意见。他在总结这场讨论的专题论文中认为我在回答“沉沦说”、“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哪里”的问题

^① 《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74页。

时，“使用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句庄严的国歌歌词”，而且认为没有什么言辞比这“更好地概括近代中国的沉沦和前进力量之所来自”。他说：“这话当然不错，但是细分析起来，以历史的沉沦而激起人们‘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吼声’代表着一种精神力量，换言之，近代中国历史是以其向下的沉沦激起人们向上的精神力量，才促成历史的前进。我则以为，不但承认近代历史以其沉沦激起人们奋进的精神力量，而且承认近代历史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赖以前进的物质力量，才更接近于历史唯物论”^①。

两位先生的意见，在原则上我都同意^②。无论是李先生所说的“历史发展”不能“不依赖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刘先生所说的在“精神力量”之外，还必须承认“近代历史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赖以前进的物质力量”，都是符合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准则的。特别是刘振岚先生，既提出正确的意见，又出之以商量的口吻，令人钦敬不已。如果容许我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在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同时，是不是也注意到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如果是这样，我想刘先生也许会同意：我和他的意见，实际上并不存在分歧。

当然，我也坦承，讨论中也的确出现了令人难以逆料的事情。举一个例吧，一向为我所敬重的经济史大家严中平先生在讨论临近结束之时，给我来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的论点不但和我的大异其趣，而且与他自己早年的观点，也大相径庭。他批评我道：“你撇开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主要矛盾，另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作为近百年历史的中心红线，把视线引向纯经济现象上去，忽视政治军事暴力的强制作用，就经济论经济，我

①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60页。

② 当然，李先生对我的“思路”的“仔细寻绎”，我是有保留意见的。

以为不足取”^①。我在上面提到，最初另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不发展这条中心线索的，不是别人，正是严中平先生自己。严
先生是一位勇于追求真理、不断自我修订的严肃学者，他扬弃了
自己过去一度十分坚持的观点，正是不断修订自我的具体表现。
然而，这却使我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因为李时岳先生刚刚批评
过我“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
史的‘红线’”，此刻严中平先生却又责难我“另立”一“中心
红线”，“把视线引向纯经济现象上去”。他们两位现在都已辞世。
请教无由。但对我而言，两位先生留下来的意见，仍然能够给我
以极大的启发，它至少让我思考为什么我所表达的意见，会在他们
两位的眼中形成如此截然相反的印象。文章有句号，辩论无穷
期。人们往往珍惜自己划上了句号的文章，然而真正值得珍惜
的，是划上句号的文章引起的无止无境的探讨和思辨。那么，我
在这里就暂时划下我的句号吧。我真诚地期待源源不断的讨论和
批评。正由于此，我把本书的副标题，由“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
心线索”改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

最后，本书多承从翰香、王方中和陈争平三位教授细心审
读，获益甚多。其中陈争平教授从课题立项到成书出版，热忱相
助，始终如一。“印须我友”，不禁低回诵之。

2000年6月初稿

2001年2月15日定稿

^①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出版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 / 张立宪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中心线索问题研究

封面设计 / 颜 黎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	
条件.....	(1)
第一节 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	(1)
一、一条史料引发的联想.....	(3)
二、一则传奇给予的启示.....	(17)
第二节 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三阶段	
.....	(28)
一、三阶段论的理论前提和中国	
封建社会中工场手工业考察	
的失实.....	(28)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三阶	
段论的特殊性.....	(36)
第三节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历史	
条件的三个方面.....	(63)
一、关于新生产力.....	(65)
二、关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	(70)
三、关于原始积累.....	(77)
四、小结——辟外因论.....	(100)